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近代早期到近現代的中國：比較並連結歐洲和全球歷史變遷模式

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China: Comparisons and Connections to European and Global Patterns of Historical Change

doi:10.6752/JCS.201409_(19).0004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王國斌(R. Bin Wong);李立凡(Li-fan Lee);胡芷嫣(Chih-yen Hu);廖晏顥(Yen-Hao Liao)

頁數/Page：18-5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專題論文

《文化研究》第十九期（2014年秋季）：18-57

近代早期到近現代的中國： 比較並連結歐洲和全球歷史變遷模式

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China:
Comparisons and Connections to European and Global Patterns of Historical Change

王國斌* 著，李立凡、胡芷嫣、廖晏穎合譯

R. Bin Wong

Translated by Li-fan Lee, Chih-yen Hu, Yen Hao Liao,

在許多課題上，我們往往認為：在歐洲歷史中形成了一些關鍵做法，而這些關鍵做法的流傳則創生了近現代（modern，19-20世紀）時期的基本特徵。這當然非常適用於那些採取歐洲理念和制度來建造自身國家和社會的白人移民社會。然而在經濟、政治和組織性宗教（organized religion）都擁有各自歷史的世界其他地區，那種假定近現代時期的經濟變遷、國家建造和宗教活動均是由於採納並適用了歐美原則和作法（practices）而驅動的想法，卻界定了理解的主軸和評估的標準。我們為了跨出此一思維取向而做的努力，已經為源於歐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給出了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紀）世界不同地區（如：中國和歐洲）的原則和作法，對於各地所形成的近現代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問題與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本文對此提出了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此一探究歷史變遷的取徑，旨在修正我們的了解：世界不同地區的歷史該如何深入研究並彼此對話，學者並由此達

* 王國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主任(UCLA Asia Institute)和歷史系教授

電子郵件：rbwong@international.ucla.edu

成關於世界歷史和其未來之更踏實有據、更思維嚴謹的理解。隨著我們越將目光從較遙遠的過去移至眼前當下，世界各地的連結也就越發重要，然而除非我們更加了解那些連結如何造就各個地區更為廣大的機會與問題群組，否則我們就沒能將多樣的歷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

一、國家與宗教

(一) 宗教與世俗的近現代劃分和在此劃分之兩側的當代國家

歐洲的政教分離已經在近代早期完成，並且，在近現代被提倡為一種國家塑造的全球性原則。政教分離，無論就其被視為西方經驗上的事實，或被視為世界上其他地區國家的規範性目標而言，在半個世紀以前，似乎都是穩確的。然而，我們今天在歐洲、美國及中東見到新的緊張與競爭帶來的挑戰，而這些緊張與競爭，是與宗教和世俗向國家宣稱它們所扮演的角色有關。更確切的說，在歐洲史中建立起來的宗教與世俗分離，不僅被用在歐洲，也被用在世界其他的地區，成為衡量許多事物的框架。然而，現在卻似乎相當脆弱、易於瓦解，這是為什麼？

要理解在世界諸多區域中、處境裡，這些當代對立的深層歷史緣由，我提議檢驗中國與歐洲在過去一千年裡，他們的宗教與政治權威(authority)的關係中尚未被重視的對比。儘管以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的方式理解歷史變遷，無法窮盡當代各種狀況的理解方式（因為這些狀況之間有許多共享的系統性要素），但我們仍傾向於忽視各種其他歷史的相關性。在這些歷史中，社會與政治之中的宗教和世俗領域之間的區隔是可協商的（有時，也是競爭的），而且，這些可協商的、競爭的區隔是相當要緊的。中國歷史中的宗教與政治權威的關係若以當代熟悉的「世俗——宗教」區分來看待，將無法獲致一貫的理解。各種有關宗教的比較，典型地聚焦在各種信仰的實質內容，或是聚焦在各種儀式展演上；而那些處理近代早期與近現代國家

建構(state making)的比較研究，則將戰爭的形成、各式官僚體系、政治聲音和民衆共識的出現視作世俗的方案(agenda)。我提議思考宗教與國家建構的關係在中國與在歐洲所存在的差異性。

要考慮宗教和國家塑造間的關係，我會將我們的注意力從概念移開，轉而投向使信仰得以傳布，並且變得有組織性的各種機制上。我也將考慮宗教建制得以調動的各種資源與權力，並且思考這些宗教建制所宣稱的權威，是如何與政治權威的宣稱互補、共存與競爭。儘管在將近現代史回溯至近代早期的解釋中，「世俗——宗教」的區分在近現代各種感知(sensibilities)裡被奉爲圭臬，但這種對歐洲史的解釋缺乏歐洲史的中世紀基礎，也同時忽略了世界上其他區域的歷史。

(二) 諸多宗教與政治權威的傳播

兼具行動力與組織性的宗教，早在11世紀前就已存在於中國與歐洲。但我希望將這篇文章的起點放在11世紀。因爲在11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兩個不相關的進程被妥適的建立起來，而這定義了它們在宗教與國家轉型的關係中的關鍵特質。在歐洲，教皇制出現了，它是爲教會在歐洲不同地區種種行動負責的、具有垂直科層結構的官僚組織。天主教會穿透各個地方社會的能力，以及建造一種既是宗教儀式的實體中心、也是與社會群體就精神上有著緊密關係的展演中心而言，比起大多數世俗政權的任何行動都觸及更多的人，也更爲直接。教會在歐洲藉著對抗異端而定義正統，也動員十字軍，發動從穆斯林控制下拯救聖地的軍事行動，並且維持著基督徒的朝聖之路。簡單來說，天主教會在歐洲之中、或歐洲之外的計畫，是在他們能進行直接文化控制的範圍之外提倡一種關於地方社會和歐洲利益的特殊觀點。

在中國，雖然各種廟宇和廟宇之間彼此有些聯繫，並且也會從遠處吸引朝聖者前來，但相對於天主教會的結構，其宗教建制仍相當不同，不僅有更大的變異性，而且更強烈地坐落於當地的環境中。儘管和尚尼姑與道士彼此有所區別，但民間宗教的實踐卻同時包含兩者，有時，各個宗教裡的神靈甚至會共享同一個廟宇裡的空間。中國社會爲神靈所浸染，而這些神靈是鑲嵌於各種宗教信仰所構成的地景及複合體中，而且這些信仰本身就是透過混合了在地以及更廣大範圍中流

傳的敘事因子而產生的。這種水平的連結創造了更大的文化共享空間，不像歐洲典型的宗教權威是單一的，且以平行於、補充於、重疊於被世俗政權所控制的各個空間的方式組織起來。相反的，以官僚體制所建立起的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禮儀實踐的新儒家模式，並且藉由認可某些神祇的方式，定義了因地域而有差異的各種宗教活動的共同核心。

在中國與歐洲的中世紀時，宗教權威的傳播開始呈現出彼此有別的形式。11世紀，中國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秩序的計畫，包含了要去影響地方宗教活動的策略。在歐洲，教皇制則正在鞏固它的世俗權力以及宗教威權，包括在定義各地方社會裡宗教正統時所扮演的角色；它的經濟權力，則藉由繼承權法規來展示（據此，任何沒有直接繼承人的財產都歸教會所有）；同時，教皇制也透過在歐洲內外的外交任務來展現其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國家對於塑造地方宗教活動的計畫，在某些標準上，比起天主教會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節制，但中國仍追求它的宗教政策，能夠跨越廣闊的空間，並且遍及——比起天主教會所服務的——更多的人們。而中國對於民間宗教的諸多政策，則是建立地方制度與基層支持此一宏大計畫的一部份。這個宏大的計畫是被一種特別的政治哲學與社會觀所推動的，它將歐洲社會中被區分為宗教與世俗的事務整合在一起。

（三）在（中國及）歐洲中世俗的與宗教的權威（非）區分

儒家（教導與扶養）的教養原則，被認為跟父母扶養孩子相關，同時也被認為跟政府管理它的人民有關。在推行、提升農業以及手工業生產政策，以及推行倉儲及糧食的商業循環的政策，以避免物資危機，並推進人民物質福利之餘，政府要做的事情即是推導人民有合宜的行為。在人類學家 James Watson 一個有關官方形塑民間宗教的努力中，含有教導性目的而深具影響的敘述裡，他主張中國國家關注的是正當的禮儀實踐(orthopraxy)，而不是正統的信仰(orthodox)。(Watson 1985) 中國領導人希望看見民眾履踐各種禮儀，像是以特定方式進行的婚禮與喪禮。這些特定的方式肯認了社會關係的等級制，同時也肯定了虔誠的象徵性表現。重要的是，就 Watson 的論點來說，這些儀

式的展演並不直接透過言辭表達來證明對於宗教信仰有特別的認同或肯定。官方的目標所要達成的是行為上的一致性，而不是普遍的信仰。在 James Watson 提出這個主張之後，曾引起討論，辯論國家究竟有多大能耐介入地方社會，以形塑宗教展演為某種正當的禮儀實踐。在一本期刊專刊裡，歷史學者 Donald Sutton 以及幾位同行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共同呈現出對於各種情境(scenarios)的集體描繪：國家管理地方宗教表現的能力，其實無法給予地方宗教堅確的正當禮儀實踐的印記。(Sutton et. al. 2007)

從考慮歐洲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之間的關係的這個角度來看，國家維持正當禮儀實踐的能力是強或弱並非關鍵。真正的關鍵是理解到，在中國，缺乏對於世俗權威和宗教權威由上至下強加的明確區分。在歐洲，宗教與世俗權威在制度上有了清楚區別的位所，此事出現在中世紀。這正是中國的國家拓展它主張有權管理跨越整個帝國的、以及地方社會的宗教與世俗事務的時期。中國國家所能控制的物質或者精神事務，其程度毫無疑問地隨著時間與空間變化，但動員國家之力，介入地方處境的這種制度化期望，無論是就物質上或精神上的理由，即使沒有被完全傳頌成一個原則，也都變成中國統治技術在實踐上所預設的立場。

因為中國沒有宗教與世俗的分離，使得宗教專家 John Lagerwey——其工作內容是研究道教經典文本並且在中國進行田野工作，這提供他的學術解釋一個深層而寬廣的基礎——聲稱中國是一個「宗教國家」。(Lagerwey 2010) 同時，當地方社會已經長期充斥著大量的神靈時——這些神靈是村莊生活中物質性的、社會性環境裡的成員——國家也聲稱它對地方社會的宗教生活擁有權威，就像它聲稱對於讓一般大眾有好的物質生活具有責任一樣。而從11世紀開始，國家的新儒家計畫之儀式，以儒家實踐為中心，並且伴隨著佛教、道教和薩滿儀式為其輔助角色（在帝國層次上，不具儒家象徵的國家禮儀依然持續著）。無論在哪個領域，我們都不會找到官員能夠成功的藉由簡單的觀念來避免饑荒、或者保證能以任何清楚的正確信仰或正當的禮儀實踐的標準來申言宗教信仰或展演儀式。然而，如果認為國家

的努力在精神和物質福祉的領域上，缺乏任何具體的、實際的結果的話，那又是個全然的錯誤。

在中國，既在地方層次上，也在國家層次上缺乏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這也就意味著，在國家層級被視作可嚮往的政策和活動，也以同樣的方式被表現在地方上。因此，中國的統治技術相對較少將不同政府層級所追求的理念加以區分。這也就是我曾經貼上「分形」(fractal)標籤的治理議程(agenda)，因為官員在每一個領土範圍的管理層次上，都有著類似的責任。(Wong 1997a: 121-22; 125-26) 舉例來說，爲了回應饑荒的狀況，縣級的官員和那些更高層級的官員，在遇到饑荒廣泛擴散時，都可能被期待著在公開的儀式中祈雨、使用國家經營的糧倉存糧去餵飽人民、藉由廢止通行稅來鼓勵商人輸入穀糧，並且規勸地方的菁英以較低的價錢賣出穀糧、甚至送穀糧給他們貧困的鄰居。Lagerwey 對於中國是一個宗教國家的建議，是一個具有思想顛覆性的提醒：它提醒我們，當我們可以輕易地將許多其他國家的行動設想爲穩固的世俗方案時，宗教的事務仍在國家各種行動中廣泛地顯現。只有在強加了宗教與世俗領域的區分的情況下，才會造成宗教和世俗領域企圖擴張其空間的需求，然而，中國國家沒有如此的想望，因爲它並不面對這樣的問題。各種宗教權威的權力與影響，在很大的程度上，並沒有與國家權威的權力及影響競爭。宗教的專業從事者雖然是附屬地被整合進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中，但相對於國家在各個地方社會的空間中只能進行有限度的例行干預，這些專業從事者則大多有著自主性的角色。

國家權力並不被限制於其正式的官僚職能上——無論在19世紀以前的世界史中這些職能有多不尋常或獨特。這些官僚職能是根據空間中的分工而組織起來的，同時也受制於成套的法規（統合成我們所謂的行政法）。官員們清楚地理解，在各級政府追求不同利益時，官員們面臨的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這些利益雖然彼此不同，卻穩確地定錨於共享的原則和治理策略上）。當官僚體系的各種行動助長了非法的可能性，或者各種貪腐行爲飛快成長時，中國的歷史記錄也就富含著許多在其複雜的管理組織系統中，發生錯誤的例

子。同時，在18世紀以前，就當時的世界歷史標準來說，中國國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舉例來說，國家可以收集中國超過一千三百個縣每十天一算的糧價資訊，從這些資訊彙整出每個府、州中數種穀糧個別的高低價格，再由省級官員按月回報給中央。基於價格與收穫的狀況，預期的與確實的結果都以正常豐收的情況為準來算出該年達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員可以估算影響城居及鄉居平民的糧食供應狀況，而且這些估算可以掌握到幾乎全中國領域的地方層級。

各種正式的官僚體制的能力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其影響力藉由爭取地方菁英自願的支持來加以擴大。這些地方菁英和地方官員有著要建立和維持地方制度的共同計畫，而透過這個計畫，希望將社會秩序維持下去。在食物供應的領域，這和菁英贊助的糧倉（在18世紀被稱為社倉或義倉）有關，這些糧倉在秋收後收集糧食，再將它的存糧借給那些在貧瘠的春天裡有需要的人們。由於缺乏角色——像是在關於食物供應管理中的情況——的明顯區分，地方官員和菁英共同扮演相似的角色，這意味著，評估近代早期歐洲史和近現代史時，相當普遍習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很難運用到中國上。缺乏國家與社會鮮明的二元區分，隨伴而來的是，宗教與世俗也無法清楚區分。這使國家更能在地方社會上有其份量。同時，當地方社會上的人們以諸多方式組織他們的許多行動時，有時會肯認官員的優先性，有時則以十分游離於那些預期的方式行動。當避免生計危機的努力可以良好運作時，前面的處境就會出現；當人們主動地去追求它們自身的宗教動力時，則後者的情況變得普遍。

國家正式官僚體制的能力也可能以另一種方式被擴增，也就是採取不尋常活動。儘管備戰會導致不尋常的活動且要因此動員人力與物力，但在世界大部份的地方來說，民間的計畫很少會常態地大規模動員。然而，在中國，開墾、建造並且維持水利工程、擴展倉儲，或者收集、編目特定主題的書目（像是農業、或依中國知識分類體系而開展的主題），這些全都是一再發生的活動。國家中最可見的、也顯然是最強烈的各種行動，卻以如此特別的活動為中心，這都依賴正式官僚體系的能力。透過它，號召勞力並且累積資源的能力被控管著，

進而影響一般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環境。Philip Kuhn 對於1768年巫術恐慌的描繪，就是一個清楚的例證：在國家實際行動上，它有能力去收集非常精確的資訊，但同時，國家對於特定地方上實際發生了什麼事的認知，容易有著根本的誤解。(Kuhn 1990) 換個方式說，各種活動，既不會每次都成功，也不會每次都具有建設性，然而，它們還是形成了一個國家介入社會的根本要件。而這些活動的成功取決於它們是否能汲取人力和金錢而不遭遇重大的對抗（這種對抗是奠基於許多不同意的原則，以及群眾們嘗試保護自己免於國家的要求所進行的活動之上）。換言之，沒有出現如同近代早期歐洲中，鼓勵國家與社會分離的制度和意識形態。

近現代所習慣的政教分離，典型地被看作在近代早期歐洲政教分離的時候就已經出現的。在這種歐洲式的政教分離之後，出現了一個定義，也就是宗教信仰是個人事務，有時在相同信仰者的社群中追求，有時則在一個大多數人分享著特別的基督宗教歸屬的社會裡被追求。宗教建制與政治權威的協商關係也就從非常不同於中國中世紀的狀況中出現。在中世紀天主教教會，以及更為分立的、主張有權控管鄉村地方（以及情況較少見的，都市中心）的政治權威之間，劃分出了不同的權威類型。宗教改革重新劃分了界限，以此在歐洲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界定了宗教與世俗的權威。宗教與世俗權威之間既補充又競爭的角色之結合隨之出現，透過這種結合，宗教在正統信仰事務上的權威就被肯認，然而宗教介入統治者生命的能力卻隨而衰微了。將宗教信仰與實踐，放進國家與社會區分裡的社會那一方，使得選擇基督教派這件事成為個人的事務和社群的選擇。而國家灌輸一套信仰的努力，則在稍後伴隨著對於民族主義的提倡出現。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的計畫——可以有宗教面向，但對國家來說首要的仍是要增加它的世俗權力和權威。

國家與社會在近現代的區分加上宗教的與世俗的區分，是在歐洲史上以及白人開拓殖民史中被形塑成的。而且這些地區的菁英將這些區分視若普世準繩。早在近代早期歷史到近現代史的這道弧線在歐洲以及全球被畫出來以前，一種重要而且在中國可見的宗教與政治權

威間的中世紀式的對比，在歐洲也能看見。同一個時期，中國國家則正在形塑新儒家式的統治議程，在這個議程裡，國家為它的官員們設置了他們在一般民衆的宗教生活裡扮演的角色。在 Harold Berman 的《法律與革命》(*Law and Revolution*)裡的第一冊，令人佩服地分析天主教會的11世紀正在經歷的教皇革命。在當時，教會的權力與權威擴張，接管了許多我們後來以為是國家的特徵與樣貌，像是：透過教會的外交人員來進行對外關係，並且聲稱對一般人民的精神生活握有權柄。

相當顯著的是，相對於中國國家介入地方社會——包含為一般人民所追求的宗教活動——能力的發展，歐洲國家缺乏這樣的能力。後來成為歐洲國家建構中的關鍵特質的是法律的編造以及法律建制，而這是以教會法的範例所開展的。當教會法在中世紀演進時，它變成其他種法律形塑過程裡的模範，無論是在封建領土上、跨越諸多城市，或是在各個皇室的政權中。多種法律系統的形成過程，是和許多彼此有別但又時有重疊的管轄權(jurisdictions)聯結在一起的（這些管轄權乃為這種或那種法律系統所涵蓋）。對 Berman 來說，管轄權與法律系統的多重性使得法律的至高無上成為必要，也同時是可能的。(Berman 1983: 10) 由於有多元法律體系，因而須在多種權威之間以及活動之間做出區劃，這樣的區劃後來歷經了法律實踐活動的整合，而進入較為單一的國家體系中。

將一大套各式各樣的法律系統合併成相對小的一群——通常每一個系統都只和單一統治者相關聯，但每個系統之間又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是歐洲國家建構的基本特質。在這個過程裡，民族國家形成，而這些民族國家一起組成了歐洲多個國家間的國際體系，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在更晚近的時期中，擴張到世界其他區域的國家制度。

就宗教與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而言，中世紀的中國與歐洲有著清楚區別的脈絡，這個脈絡與宗教和世俗的區分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在歐洲的具體化有關鍵性的關聯，也和在中國，沒有這些二元對立，但各方面皆甚為活躍的情形密切相關。中國國家可以在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上實行其意志的程度，毫無懷疑地是有限制的，甚至在

某些處境下是相當邊緣的。但國家想在定義合法的、適當的宗教活動和展演的事情上扮演裁決者的意圖，是其作為管理地方社會活動宏大議程的一部份，也是國家與社會群體非競爭性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示。在中國，沒有社會群體可以組構出足夠規模的意識形態和制度資源來對抗國家的活動，或者界定異於官員追求目標的其他令人嚮往的國家活動。相反的，歐洲式的國家與社會分離，以及在宗教與世俗之間的區分，在某些重要的意義上，藉著天主教會法傳統的權力與說服力，為其他法律系統的建造提供模範與靈感。那些過去數十年，在宗教的支持下被調動的資源與人們，顯示了被宗教鼓舞的群體有相當的能力和潛藏的實力，足以在世俗社會中動員，從而得以對國家該如何與社會中的宗教和世俗發生關聯、提出要求。這是在當初政教分離的基督教脈絡中就已經相當清楚的。而宗教和世俗相對的區分，已經被在歐美社會中可見的伊斯蘭教的現存實在(Islamic presence)所複雜化，因為對於伊斯蘭教而言，宗教與世俗的劃分從來不像在基督教的环境般穩固而具體化。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這兩種宗教信仰同樣都有意識形態和制度的資源，來對國家做出主張，或對國家權力提出要求，但這種現象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我們當代世界跨越世界上數個區域的基本特質，既是歷史地也是現在地，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中宗教所具有的位置是有清楚對比的。

談到國家形成與轉型的過程，宗教的重要性在中國與歐洲是十分不同的，而這些不同警醒我們，在中國與歐洲，國家建構經驗也有著根本的不同。Alexander Woodside 在他引人深思的著作《遺失的諸多近現代性》(*Lost Modernities*)是他將關注焦點放在中國、韓國與越南之漫長的官僚體系制度經驗，究竟對我們有何挑戰，以及對我們提供了什麼機會，所做的研究的一部份。他指認出官僚體系和法律，在中國和歐洲國家形成的過程裡扮演著非常不同的角色。(Woodside 2006) 他參考 Berman 那本我先前已經提及的《法律與革命》，為的是藉由教會法作為其他種法律的模範角色，來說明宗教和世俗國家之塑造中有緊密的關係。他因此在三個他所檢驗的國家中將那種緊密關係之缺乏做了對比。然而我們可以為這個重要洞見做個補充：宗教和世俗國

家分享一套共同的法律原則；而民間宗教和中國國家則同樣依賴官僚體系。因為正如 Arthur Wolf 在數十年前曾討論的，至少有些神靈得集體向其他神祇報告，這是官僚體制階層化的一部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差異（將國家建構活動的重心放在法律或者放在官僚制度上）逐漸隱沒無聲了，因為，中國人也發展了法律制度，而歐洲人也發展了官僚制度，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相當好奇，對於國家運作和活動來說，法律和官僚制度在中國和在西方持續有著不同的重要性，這個對比會不會至少是形成於更久遠的、具有差異性的歷史之中。

在當代美國和歐洲社會中，那些自主宗教團體意識形態的、制度的資源，是市民社會的構成要素。這意味著它們可以表達對於社會活動的期待，這種社會活動要求政治權威為某種政策背書。而中國，則缺乏在國家與社會、宗教與世俗之間，意識形態上具有說服力的制度化區分。就實際的意義上來說，當然，許多事務大多決定性地發生在國家領域，少部分則發生在社會領域，而宗教的活動就發生在社會領域中，這是相當清楚的。但是，當代中國已經確認一種權威，這種權威呼應著明清時代(late imperial)國家對於宗教活動的介入。除此之外，就如同明清時代一般，當代中國國家堅持宣稱它有介入社會活動的特權，這種宣稱是更普遍地依賴於在國家官員和社會菁英間有著共享感知的議程上。這種協定對於明清時代社會秩序的再生產是非常根本的，至今其重要性仍不減。但是日趨分歧的菁英，他們的熱情和對事物優先性的看法也日益分歧，再加上一般民衆（原只能接受國家界定的計畫為共同目標）的熱情與對事物優先性的看法也很分歧，使得要維持這種協定變得日益困難。當代中國更為普遍的管理危機來自於一個脆弱的特質，這個特質是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存在的一種有效率的、具有彈性的統治形式，而這種統治形式依賴「國家—社會」的連續體，在這個連續體中，缺乏任何自主性宗教建制，使得他們無法宣稱具有社會權威，也無法以此與政治權威互補，或對它提出挑戰。在歐美社會，宗教建造信仰者的群體，這些群體的聲音可以對他們的政府有所要求，而他們偏好的社會實踐方式也可能對世俗國家造成困難和問題。

Jürgen Habermas 曾將某些在歐洲以及透過歐洲移民與殖民而歷史地產生的白種人殖民社群中的現象說成是「後世俗」(post-secular)狀態。對他而言，之所以有必要與此針鋒相對地挑戰的原因，很顯然是因為它太過限定於上述的那些環境了。(Habermas 2008) 然而，對人們來說，似乎相當容易就將這「後世俗」情境看成是普遍存在的。除非給予世界其他地區特殊的關注：他們非常難被削足適履地說成是「後世俗」的，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是單純僅是「世俗」的。轉變到後世俗，這得先前存在著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這種區分難以適用於中國，並且以不同的理由，也無法適用於歷史上的，或是當代世界上的其他區域的狀況中。確實，若我們的社會理論要能達到一個更能在經驗上適用於全世界範圍的潛力的話，至少我們得有這種認知：如果我們所依賴的社會理論，其命題須依靠那些來自單一區域（以及其延伸）之歷史經驗所產生的普遍性說法，則我們在知性上會是有所欠缺而難行久遠的。所以若我們回到中世紀並且考慮過去千年的宗教和政治權威的關係，我們可能就會更好地理解，從近代早期世界到近現代世界各自有別的歷史變遷軌跡，以及變化多端，但又相互連結起來的各種困境，而這些困境是與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遭遇的宗教及政治權威有關。

二、財政關係

近代早期歐洲政治經濟、或近現代時期更普遍的政治經濟之一項核心特徵，就是財政作法(fiscal practices)分別與國家政治議程(state political agendas)和經濟變遷(economic change)這兩方面之間的關聯性。成功的近代早期歐洲國家均成功打造軍隊並擴張經濟；他們建立官僚體制和相關機構供菁英與王權協商。整體而言效能頗彰的近現代國家在利用經濟來萃取資源的同時，也頒布政策來穩定經濟活動和促進經濟成長。一批大多專精歐洲不同地區的經濟史家最近出版一部財政國家(fiscal state)興起的全球史，《財政國家之興起：一部全球史 1500-1914》(*The Rise of Fiscal States: A Global History 1500-1914*)。

(Yun-Casalilla and O'Brien with Comín Comín, 2012) 一大主軸是將促進經濟成長和國家效能的近現代財政政策之可取特質(*desirable traits*)，連結到始於近代早期歐洲的作法。從歐洲的角度來說，此一作法相當合理，因為，歐洲史之中現成存在著從近代早期政治經濟轉移到近現代政治經濟這樣的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財政國家之興起：一部全球史 1500-1914》亦清楚指出，歐洲各國間也頗有差異，但英國足為標準個案，18世紀顯著的賦稅擴張和公債(*public debt*)發展不僅刺激國家成長，也為英國在19世紀的經濟成就和政治權力預作準備。《財政國家之興起：一部全球史 1500-1914》遺漏了美洲和非洲，不過我們能合理期待，若要討論從近代早期歐洲、到政治與經濟俱獲成功的近現代歐洲、再到更普遍的成功世界，此一歷程中的邏輯是如何成立的，則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汲取歐洲理念和制度的白人移民社會將是絕佳例證。同理，非洲與南美洲發展歐洲式的國家與經濟卻在19世紀中葉挫敗，亦可歸因於他們缺乏歐洲倡行的可取特質。19世紀後期部份南美國家施行財政改革藉以佐助經濟發展並擴展國家能力，便可視為採行歐洲作法的結果。

若說近代早期歐洲財政作法對國家建構和經濟發展有正面效益，而這些財政作法隨後替近現代財政政策鋪路、成功的近現代國家和經濟便是依循此道，這樣的說法似能解釋近現代世界其他地區各種成敗案例。但是深入檢視中國的個案便能發現，「與歐洲不同的近代早期作法無助於近現代作法的成功」，充其量也不過是個不夠完備的假設。

「非西方作法若與西方不同則應被西方發展的作法取代」這種假設存續至今，所帶來的後果問題重重，因為，即使在面臨全球性公共財政困難的當代世界中，我們仍在想像對於這些問題合理的解決方案僅能在西方的環境中制定出來。社會科學仍是基於這種不對稱假定，認為西方的作法是近現代原則與政策的唯一來源，而且歐洲及白人移民社會以外的地區，其政治與經濟之成功必得採行某種版本的西方作法。¹

這種初始假設——認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整體政治經濟和特定財政

1 譯註：本段中之引號標記為原文所無，是為求譯文清晰而加。

作法之善惡評估(assessment of the virtues and vices)須與歐洲範例進行比較——之所以會造成誤導，並非因為這種假設毫無可取，而是因為其只指陳了片面事實(half-truths)而使得我們難看見其錯誤之處。於是，世界上其他地區若不自限於以本身與歐洲之異同來衡量財政實務之意義，我們就面臨了該如何為他們建構政治經濟敘事的挑戰。重建並了解世界其他地區之財政作法及其政治經濟脈絡，此種努力所帶來的知性報償必當讓我們更了解近代早期全球經濟與政治的歷史、這些歷史與後續歷史變遷型態(patterns of historical change)之間的可能關聯、以及這些知識將如何引領我們預測未來可能的發展。本文只能為更大規模之計畫提出關於研究策略要素的建議。在本文以「由近代早期至近現代的中國歷史」(“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in Chinese History”)為題組合起來的脈絡中，本節將從政治與宗教的議題移開，轉向討論居於政治挑戰與經濟可能性之間樞紐位置的財政關聯。本節大致的主題與前一節論宗教國家建構(religious state making)相同，舉出關鍵對比以將更普遍的議題著落於各自的歷史脈絡中。就本節主題而言，先在歷史脈絡中考察近代早期歐洲財政作法的三個關鍵特徵將是有助益的，而我這裡所稱的歷史脈絡，指的是歐洲世界的國家建構競爭(competitive state making)和連結了歐洲統治者和世界其他地區之產品與人民的歐洲商業資本主義(commercial capitalism)。

首先，Charles Tilly在1975年及其後的作品中論證：發動戰爭和統治者需要藉增加財政收入以建造軍隊和官僚體制，此二者都與歐洲國家的形成密切相關。(Tilly 1975, 1992) 歐洲的統治者們協助提倡國內與國際商貿，藉此與其他歐洲國家進行經濟競爭並利用世界其他地區的產品與人民；他們若不是對商人課稅便是自行派出人員管理商貿交易。(Yun-Casalilla 2012) 正如 John Brewer 在約莫25年前所說明，足以支應強大可畏海軍的商業收入便是18世紀英國的「權力支柱」(sinews of power)。(Brewer 1990) 但影響國家財政成就的不只是英國發展出的這種徵收貨物稅(excise taxes)的官僚體制。當稅收不夠時，國家也會發展金融工具來獲取更多必要資源。不同於英國皇室，法國國王無能償付 1760 年代積欠的戰爭債務，他新提出的稅目或貸款也未獲

支持。所造成的財政危機日益惡化而成爲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背景因素。財政的崩壞與成功在近代早期歐洲史上都有政治後果。此般英法的對比，也能延伸到近代早期歐洲財政作法的第二個主要特徵，亦即王權與菁英的關係。

菁英與歐洲統治者的關係是奠基於一些爲土地、商業、宗教菁英所廣泛認可的原則上。這些菁英有著清楚有別的社會身份和經濟利益，此亦成爲組織會議的基礎。當統治者認爲有必要討論他們彼此都重視的事務時，就會召開這些會議。在近代早期，資助皇室戰爭可說是這類事務中最重要的一種。英國國會從 1688 年光榮革命開始取得增加財政收入的掌控權(authority)——國會不能啓動公共開支，但能控制王權是否能夠從歲收取得資金（以及能取得多少資金）來開啓新戰爭。²專制的法國國王就未受此牽制。然而這並不表示他能輕易調動新歲入；確實，他無法向某個單位尋求新歲入，因而不得不與王國內各地區的菁英協商討論加稅。正如 Hoffman 和 Rosenthal 所說明，比起法國王權沒有國會掌控稅收決定權，英國國會能允許的稅收程度還更高。(Hoffman and Rosenthal 1997) 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著名訴求「無代表，不納稅」就是引用英國國會的稅收決定權爲原則。這種意識形態斷言(ideological assertion)和徵稅權力應該著落於何處的主張，是代表制原則(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on)的基礎，也是Reinhard Bendix 所指陳的近現代民族國家之形成（他視此一形成過程爲政治權威之基礎「從國王到人民」[kings to people] 的轉移）的核心要件。(R. Bendix 1978) 奠定徵稅權的政治基礎設立了重要的政治原則，但這並未說明近代早期歐洲和其他地區財政作法的第三個重要特徵，亦即國家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近代早期歐洲國家在歐洲之內或透過海洋活動在其他地區都用各種方式彼此進行經濟競爭。對近代早期歐洲統治者而言，一套被後世學者稱爲「重商主義」(mercantilist)的思想形成了他們的財政決策而影響經濟。整體來說，他們想要提昇國內生產並將產品賣至國外，藉

2 譯註：此處以及本文其他中文括號皆爲原文所無，是爲求譯文清晰而加。

著這些活動聚斂更大量的貴重金屬，以供給商貿交易的貨幣。這種始於歐洲之內的競爭，延伸到對海外領土的交易與榨取。歐洲統治者從美洲殖民地開採資源（例如，西班牙開採銀礦），並創造農產品與工藝品的交易（例如，英國製造產品賣至北美殖民地，當地又將魚、木材、穀物和麵粉銷至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西印度群島又將蘭姆酒、糖和糖蜜 [molasses] 賣到英國）。在世界的另一端，亞洲地區的歐洲貿易商購入胡椒和其他香料運回歐洲；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先後意圖主導這些貿易。對近代早期歐洲國家來說，歐洲對外貿易是能帶來商貿經濟擴張的收入來源，而且免除歐洲內部貿易課稅所引發的疑難雜症——徵稅會提高產品成本而損害貿易。

諾貝爾獎得主 Douglass C. North 已強調過葡人與荷人組織海外商貿活動所造成的不同經濟後果；比起統治者直接控制的商人群體，國家規範(state-regulated)的私人貿易公司其商務活動更有效率。(North 1997) North 舉出此項對比，也就是意指私人企業活動（它們對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之物質世界轉型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而言相當重要）是具有優越性的貿易活動類型。但是近代早期統治者之不同政治決策所造成的經濟後果並不表示就是爲了經濟而非政治因素而作出這些決策。況且，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若得以順利保護自身的壟斷(monopolies)（亦即確保其國人在他們公司之外進行的私人貿易不至於對他們造成傷害），其實是抑制而非激勵了開放市場的企業活動。18世紀晚期的市場競爭擴張，銷蝕了這種特許公司式貿易限制的極限，這導致英國政策轉移並帶來悲慘後果。當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法阻止私商違反前者建立的獨占壟斷而直接與中國商人互動，英國政府必得找出替代收益，後來終於以在印度種植鴉片並賣往中國達成此一目標。英國國家倡行私人企業和商貿擴張，這些修辭得以維持乃是憑藉19世紀上半葉發現了新策略來補足印度殖民地的統治開支，而這正是啓動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工業革命時期。在世紀之交，此二發展彼此並無明顯而直接的關聯。英國19世紀早期對歲入的政治需求以及它的經濟轉型，二者的連結主要在於國家對商貿擴張徵稅而獲得歲收，即使必須依靠政治力量來創造商貿並罔顧毒品走私的

道德約束也在所不惜。

19世紀早期，英國政府能對印度棉織的進口課稅來支持發展棉紡織工業，並提倡印度種植鴉片罌粟賣給中國。財政政策乃為經濟利益和政治獲益而頒布。英國成功發展財政國家而帶來18世紀國家貿易增加和後續19世紀的工業化，這種教科書式的標準經驗鼓吹將近代早期至近現代的歐洲歷史更概括解讀為一種故事：成功的近代早期歐洲國家採行有助成長的相關政策，其後代則專注於發展工業資本主義。企圖將此二時期連結起來，並就財政政策的面向找出得以將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區隔開來的自然邏輯，這是很強烈的誘惑，其強度足以吸引最資深傑出的歐洲經濟史家之一寫出類似敘事。Patrick K. O'Brien 深度省思《財政國家之興起：一部全球史 1500-1914》其他文章時，就想著他所謂「在經濟上具有效益之國家的財政基礎」(fis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ally effective states)。在他的檢視之中，他連結歐洲國家的形成過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視此相連要件同屬另一更大歷史曲線，使歐洲有別於其他地區：「國家的形成是長期成長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且若要解釋東西方經濟分流，國家的形成也會是這種敘事的重要一章，至於在近現代工業化全球史(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上已然觀察到的領導者、追隨者和趨同融合這個序列之中，國家的形成也可能是關鍵要素。」(O'Brien 2012: 444) 這般取向使得他把從近代早期歐洲國家形成、到這些國家後來為支持工業化過程而發展的政策、再到維持近現代工業化經濟，視為世上絕無僅有的歷程。更明確來說，這促使他論證19世紀西方與其他地區之經濟分流乃是起源於從威尼斯到鴉片戰爭的財政抉擇，亦即近代早期歐洲國家的財政政策。

O'Brien 為財政政策對經濟變遷之影響所提出的論證，有何分析性結論？O'Brien 的重要斷言之一是帝國不可能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O'Brien 2012: 456) 表面上看似相當直截明確——19世紀的領土型帝國(territorial empires)都沒變成工業社會。但是為什麼呢？我們能一窺 Bartolomé Yun-Casalilla 關於近代早期財政效能之最佳國家規模的論證：「小型政治單位(small political units)難

以籌募足夠資金來擁有競爭力以保衛臣民的財產權和市場。大型政體 (big polities) 則苦於規模之不經濟 (diseconomies of scale)、資訊困難以及與遠地菁英協商的極高成本。長距離的資金移轉和安全都造成極高的財務成本。」 (Yun-Casalilla 2012: 23) 但是這個關於空間規模的論證在近現代時期也能成立嗎？對19世紀固然成立，而20世紀就不甚盡然，領土型帝國此時的後繼國家確實工業化了，中國、印度或俄國皆如此。對此現象，一個簡單的緩解之計當然是指稱20世紀的國家不再是帝國。但既然對帝國的宣稱主要是涉及它們的規模而非政治制度，那麼為何帝國不是發展型國家但其後繼者卻是，這個問題就值得深思。

我們可以預期，關於20世紀中國、印度和俄國何以出現發展型國家，有一種解釋是由於這些國家各別採用了西歐或美國首創的思想和體制。不過稍一觀察中國近現代工業經濟的形成、以及這個轉型與整體政治經濟及特定財政政策之間的關係，則可見一種自近代早期至當代、與歐洲不同的經濟與政治轉型模式，雖然這些活動至今已使兩個地區都進入政治和經濟皆相互連結的共同世界了。如此地檢視，則可支持一個論點：近代早期的財政體系各有不同，而且，其間的差異對於各個體系在近現代如何演變而言是至關重大的。此外，呼應各地區國家面臨的挑戰和擁有的能力，近代早期各國財政系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角色亦各有差別。這些差異並未阻礙西方以外的地區後來發展出策略來轉型他們的國家和經濟，如此既可能援引歐洲所原創之追求財富與權力的原則，也可能採用根據自身歷史而來的輕重判斷和政策。中國財政變化的性質與意義，無論就政治上或經濟上來說，都不能僅僅從追索傳統中國作法如何被外國作法取代而推導出來，儘管這種研究方式頗為習見而傳統，但至今猶存。與其接納Patrick O'Brien所建議我們去認清並接受的這種命題（即，在經濟上具有效益之國家是經由相似於近代早期至近現代歐洲的財政政策發展而形成），只要回顧中國的證據，便顯示其國家轉型的政治過程與歐洲甚或更廣義的西方頗不相同，而財政政策不僅嵌於其中，也促成當代中國經濟崛起之形成。

明代(1368-1643)官員的輕稅(light taxation)政治理想有其可敬的知識系譜。中國政治思想家自古典時代(classical times)即開始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藏富於民而使人民更能備荒避困。人民富足、生計無憂，於是社會穩定、治人者得以安穩無虞。賦稅有節的原則進而被納入更寬的一套原則之中、旨在促進糧食供給安全(food supply security)。16世紀時國家提供了公共秩序以及如水利(water control)和糧倉(granaries)等社會財(social goods)。此一時期遠距貿易因商人網絡遍及帝國各處而蓬勃發展。商稅(commercial taxes)薄且按中央政府所訂稅率徵收，表示帝國各處租稅歸宿(tax incidence)的總差(gross differences)遠比在主權分立的政治體系之下——如歐洲——還更低。

具有經濟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中國菁英並非組織來追求特定政治利益的群體或個體。在中國沒有體制化的機制(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s)讓他們罔顧他人福利而為自身的特惠發聲、影響政府政策——近代早期歐洲社會則存在這般現象。對比歐洲的國家與菁英間關係，中國菁英與官員共享一套社會議程(social agenda)、推動地方體制(local institutions)來維持社會秩序。(Wong 1997a: 105-26) 由於帝國龐大、官僚的嚴密監管能力又很有限，官員和菁英便聯合創造地方體制。儒家期許菁英協助維持地方社會秩序，而且國家不曾反覆超常徵稅，表示政府之手通常不向地方社會施加壓力。政府在18世紀大舉施作時——重大水利翻修、擴增糧倉系統、大型軍事行動——便徵收了一系列非常態賦役(non-statutory levies)。但不同於近代早期歐洲欲求更多資源的痼癮、連超常稅賦也永遠無法滿足，近代早期中國統治者在相應計畫完成後便取消超常徵調了。

近代早期中國的國家和經濟的關係以及國家徵稅和支出的影響迥異於歐洲的作法。中國人從14世紀至19世紀中葉均高度仰賴土地稅和勞動稅(land and labor taxes)；商稅只是偶一為之。中國財政政策遂使貿易之進行得以免受徵稅妨礙。此外，官員反對富商以操弄他們所控制之商品的市場供給來影響價格，藉此，官員促進了工藝與農作產品的流通——這項原則是普遍適用的，但在穀物的情況中尤其如此。如此即可強烈對比近代早期歐洲國家的作法：限制商人參與主要海洋商

貿冒險的人數、而統治者則由此貿易提取重要歲收。中國確有限制特定市場商人人數的政策事例——鹽和廣州貿易體系是18世紀的主要案例——但是，一般而言，若將提倡開放貿易與控制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二者對比起來看，則此二者在近代早期的兩個地區（中國與歐洲）中的相對重要性，卻各有不同。與此同時，近代早期中國和歐洲的生產和貿易都有所擴張。財政政策在這兩個區域中亦個別促進和限制了不同類型的商貿成長。更廣義上來說，中國的經濟政策促使了最佳農耕和工藝生產作法廣為流傳，有助於建立並維持運輸體系和生產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水利設施），並且為帝國境內帶來普遍和平，使得貿易障礙比當時歐洲更少。

對於特定財政議題和更廣義的經濟發展，近代早期政府的政策影響了中國和歐洲商貿交流的演變，但是人們往往更直接且明顯地將近代早期歐洲的財政措施視作是為回應工業經濟的機會和需求，相對之下，這些措施也為近現代歐洲國家的財政政策預作了準備，這件事情則不甚清楚。此外，中國與日、韓兩個東亞鄰國類似，於19世紀後期對歐洲的財富和力量印象深刻，並把握師法的機會來創造既有政治實力又有經濟財富的強大綜合體。這些國家在19世紀對廣義經濟發展和特定財政政策的態度甚為相似，其相似程度，比起將兩個地區（歐洲與東亞）分別來看其各自的近代早期與近現代財政政策之間的相似性，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可能性經常而顯然地被忽略了，因為我們有歐洲專家強調近代早期至近現代時期的延續性，而東亞專家則在比較中日兩國如何回應費正清(John Fairbank)所謂的「西方衝擊」(Western impact)時，訴諸標準比較(standard comparisons)，一面稱頌日本採行外國體制和政策、一面批評中國無能如此改頭換面。當然，學者也承認中國國家19世紀晚期面對日本所無的政治挑戰——帝國的規模使得國內社會秩序議題越發嚴重，18世紀諸般動亂之後則必須持續結合官僚體系和菁英的努力來鞏固穩定性；隨後與外國的敵對戰爭，尤其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 1900 年的義和團運動(Boxer Movement)，使中國國家擔負了鉅額賠款、支配了後世所知帝國末年的財政挑戰。帝國於 1911 年瓦解而完結了中國這場挫敗。

國家在敗亡之前無法再本於既廣且深之財政基礎啓動經濟變革計畫，或思考這個幅員與歐洲相當而人口多出四分之一的地區如何轉型。了解到即便超過一個世紀之後許多歐洲東部地區仍未發生始於英國的工業化，數個政府超過百年才能辦到的目標，若是期待任何單一政府在上世界上另一幅員與人口相當的地區竟能劇烈變革而且成功，此一想法本身就是沒有道理被提出來的。

1911 年清朝滅亡到 1949 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近四十年的飄搖動盪，為中國支離破碎政體的統治者帶來多重挑戰，其中增加稅收以支應戰爭就呼應了近代早期歐洲的國家建構。1949 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之後，歐洲式國家建構和經濟變革的敘事很快就與中國的狀況不相干了。既是社會主義專政(socialist dictatorship)，國家的廣義政治經濟和特定財政政策的特質都將追隨蘇聯模式，因而與公認的標準發展模型分道揚鑣。但是，O' Brien 和 Yun-Casalilla 的論文早先所提出的，以財政而言最有效益的國家規模以及帝國無法適用於此一規模的種種觀察，又當如何呢？我們或可推想，帝制國家(imperial state)變遷為社會主義國家，使得在兩百年前不為人採信的事情到了20世紀下半葉變得可能了。此則鼓舞我們做了如下假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型乃是起自近代早期的作法，因而是歐洲模型的近現代變形，以此之故，明清時代的過往就無庸納入我們對 1950 年代中國國家財政政策的評估之中。然而，將 1950 年代中國財政政策和早期歷史上的作法平行對比的話，我們卻會有不同的看法。

共產黨國家掌權頭十年立即重申中央政府握有完全的徵稅權力，他們利用地方官僚來為中央動員歲收的作法跟兩個世紀前的中國國家相同，而且就如同更早時期一般，直接農業稅收(direct agricultural taxation)是中國財政策略的重要特徵。地方政府也像兩個世紀前一樣再度被刻意安排得資金不足。當國家需要組織重要公共工程計畫時，就透過政治運動來動員資源和人力，手段則使18世紀的作法相形見绌。

過去二十年間，重大財政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得以重獲更大比例的稅收；稅收成長得比整體經濟更為緩慢，許多國內外評論仍將焦點擺在政府必須作一些改革來處理問題，而外國觀察家則相信自己知道該如何

解決那些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史無前例成長的事實令人無法忽視而必須解釋中國的策略有哪些特點，也必須解釋這些策略以哪些方式解決了更普遍的問題。比起美國或歐盟這兩大世界經濟體的成果。

我們習於期待西方定義的最佳作法遍及全球，而甚少認為最佳作法可能來自別處。日本的經濟成就創造了始於 1979 年 Ezra Vogel 《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研究浪潮；而當日本在過去二十年間陷入因政府政策而加劇的結構性停滯之後，日本的成功很快就被拋諸腦後。該次經驗或許讓東亞事務觀察家們更不願意考慮中國式方案有可能解決晚近美國或歐洲的問題，同時我們仍安然宣稱西方作法在世界各地還是很有道理。然而，我們知道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已經證明遠遠不如理想，而歐洲以歐盟空間規模力求民主治理也證明充其量仍脆弱不堪。何以世上此二主要民主地區的政治體制該為中國提供統治方面的操作原則，其理由就經驗上而言不甚明瞭。若我們將治理的行政層面與治理的政治特點區隔開來，便能深入追問歐美的官僚體制的效率和有效程度是否確實高於中國。但是即便有人認為中國財政作法的一些特點比歐洲或美國方面還更有效（例如，該國政府對 2008 年金融／經濟危機的凱因斯式回應），我們仍能輕易發現很好的理由指出中國式作法不適用於美國或歐洲的民主環境。然而與此相稱的議題：中國環境何以應該安然採納西方作法？大多數學者似乎對此頗不以為意；因為，這簡直被視為理所當然。

更平衡的觀點——包括認明共同挑戰，如：世界三大地區的地方政府都資金不足——則會考量財政議題如何契合獨特的政治與經濟機構群組、藉此評估個別的歷史發展如何形成相應的問題和可能性。誠然，日益緊密複雜的全球關聯形塑了系統性的機會和限制，這些關係將世界各地的歷史都放在特定的框架中——脫離了近代早期、穿過了近現代、來到了當代——而我們就在此框架裡拼湊著未來的圖像。我們對未來的政治經濟關係（國內的、區域的、全球的）如何能形塑得更好？倘若能更妥善量度多樣的歷史——在這些歷史中，彼此有異的近代早期財政意識形態與制度（舉例而言，中國的和歐洲的）提供了相互有別的模式，在各自的模式中，不對稱的政治和經濟的活動在近

現代浮現了，晚近則被更為平等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所取代——我們應該可以將它形塑得更好。當我們認為自己全是活在本身特定的一套路徑依賴式的政治可能性(path-dependent sets of political possibilities)之中時，關於概念與制度創新如何得以更為自由地流通一事，在晚近的情境中，還未曾有較為相稱的、學術上的理解與認識。

三、中國、歐洲與世界的工業化

19世紀中國遭遇到了近現代世界，對大部份述說這一歷史的敘事而言，費正清的「中國回應西方論」(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已證實了是一個十分耐用的框架。這個框架在60、70年代早期備受推廣，卻也飽受來自爭辯帝國主義之惡的左傾學者批評，但這些學者的評論，與其說削弱了19世紀中國史當中這個「本土——外來」主軸的重要性，毋寧說，它們改變了對西方衝擊中國這件事的評價。20世紀晚期的中國中心論學術研究，則將研究往前推到19世紀外來新危機的脈絡尚未發生之前，賦予17、18世紀的漢人、滿人更多關懷與選擇的自主能力(agency)去形塑自身世界，但是，這些研究並沒有將19世紀中國史自回應西方的主軸中給移轉開太多。在政治與經濟問題上，中國史學者仍然將重點擺在程度不一的兩造揉合上：一是西方典範或權力的強度，另一則是中國發展西方政治體制與經濟措施之種種努力的成效——或較典型的，種種努力的不足。

這些有關19世紀中國史的感知與認識，為擁護五四時期(c. 1920)在地／外來、傳統／近現代二分的學界所堅持，並延伸到不管以中文或何種語言所書寫的20世紀中國史研究裡。中國在19世紀的時候踏進了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全球史當中，而我們對此所採取的觀點，是依據那些將西方想法、制度認作進步，而將在地習俗、措施的存續認作退步的衡量標準。相同或類似的準繩，也進而被應用到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這種史學境況並非只發生於中國研究上，但在過去三十五年中，這個國家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恢弘轉變，卻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史學境況，在一篇以19世紀晚期中國努力回應西方為起首的敘事裡，這

三十五年間的轉變發展，可以輕而易舉地被寫成其中一章。但是，在談到中國的經濟轉變以及國家在鼓勵某些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大多數有關這些課題的討論卻一直以來忽略了，在中國的領導者們意識到西方科技之前，他們的政策方針以及對政治事務優先順序的判斷，與以上這些課題是息息相關的。

中國對財富與權力的追求（通常這被認為是一種以適應、採納西方政策與經濟措施來回應西方的方式），至清代末期，成了一種轉變、重振經濟的政治社會規劃。21世紀的我們在觀察這段期間時，基本上必須理解的一個問題是，晚清國家官員如何漸漸地將創造財富與權力的當務之急給概念化並付諸實行。由於語言是最容易領會的層次之一，我們就先從這裡來思考這個充滿挑戰性的問題：英文，一如其它語言，通常區分週期與非週期性時段，比方說，英文區分建設(construct)與再建設(reconstruct)，但是在中文裡，單單「建設」一詞就包含了這兩種涵義。當翻譯中文「建設」一語時，我們會在英文“construct”和“reconstruct”中二者擇一——如「中國建設銀行」(Chinese Construction Bank)，或1920、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我們在英文裡區分新製的以及重製、再製的，而忽略了一種可能，就是在這兩端中間，有一個關於改變的概念空間，它保有一種延伸的可能性，一邊肯定早先的模式與程序，一邊向前進，不管那些模式與程序本質上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還是文化的。以下，我將會提議，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中國所理解的「工業」，不僅僅是我們所熟悉的機械化工廠產業這個19世紀工業化新玩意，同時也是幾世紀以來農村市場生產所不可或缺的家庭手工業；中國在19世紀晚期，為提倡一個強盛國家與繁榮社會而進行的實際政治操作，涵括了兩種政策，其中一種是我們認為許多國家為了回應西方帶來的壓力與契機、普遍來說都會做出的新鮮嘗試，另一種則深深植根於傳統關懷，而被我們貼上最是中國的標籤。清朝最後十年的官員並不是一味地鼓勵以外來代替在地、或在新舊之間擇一，相反的，他們設想著一個在國際上可以讓這個國家更有競爭力、在國內則能夠讓這個社會更繁榮的機構制度平台，而將這兩個計畫連

結在一起的關鍵，就是一份可以同時促進城市鄉村不同產業發展的工業化方案。

（一）晚清工業化的社會、政治基礎

1870年代間，大清國官員受加強軍事力量以抵禦外來威脅的焦灼渴望所驅，對近現代工業的興趣，一開始主要集中在軍火業與輪船建造上。有關從這時開始的工業發展的嘗試，上一代的學者評價，主要聚焦在他們認定的、這些嘗試當中的政治或經濟局限上。(Feuerwerker 1958; Chan 1980) 就政治層面而言，因為是省級官員在帶領計畫事業的設立工作，所以，大清國對挑戰的回應，通常被認為會造成權力連帶下放，因而也就成了中央政府權力逐漸衰微的跡象，最終走向1911年的傾滅；而就經濟層面而言，因為看不到像是日本明治時期那樣的工業化流程，意味著政府在獎掖經濟發展上做得並不多。諸如這般的評價，向來都是奠基在一個關於歷史變遷的更大模型中，這個模式在西方社會的性格特徵以及近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特性間畫上了等號。雖然歷史學家與其他學者自信不疑地擯斥了基於現代化理論而述說的種種泛泛之談，但是，要建立另外一個角度理解清代政治、經濟系統如何轉變——以及更確切地說，中國行動者認為他們在做什麼、以及這些行動所造成的有意或無意的後果——我們離成功仍差之遠矣。

在歐洲與美國，19世紀晚期是一個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時代；建立在私有財產上的市場經濟，以及支持這個經濟秩序的種種政治體制，獎勵資本大量集中，以便建立新式工業中舉凡鐵路、化工、或其它重工業等大型產業。日本方面，則是在19世紀晚期出現了一些工業與財務經濟的企業集團，它們構成了日本經濟成長的機構基礎。至於中國方面，確實不見任一機構體制，可以幫助發展那些在世界各地皆相當重要的產業。撇開儒家輕視商人這個一貫刻板印象，中國政治經濟體向來都重視市場商業交換：長程貿易由複雜精細的商人網絡構成，其幅度橫跨了帝國數個省份，而地方市場系統，則提供了農村家庭可以販賣作物與手工業產品的場址。近代早期的中國官員所屢屢反對的（特別是在食糧供應的問題上），是市場控制的獨占或寡占，他

們認為商品應基於供需情形而自由流通，對市場干預抱持猜忌，不管這些干預是來自富有商人，還是那些企圖限制作物輸出以保護轄區百姓供給額的省級或地方官員。(Wong 1999) 政府批准的壟斷貿易，只限於鹽業，以及那些在廣州持有執照，與西方人貿易往來的商人。

那些透過販鹽或對外貿易而致富的、相對少數的巨富商賈，身負著官員們對他們的期盼，也就是當有財政需要時，他們可以充當財源。有時候稱作「捐」，這些由富賈移轉給官員的金錢，符合了官員認為巨商須協助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的社會期望。在這些期盼背後存在的，其實是一份更深遠的、官員與社會菁英彼此之間的默契 (understandings)，它使雙方矢力同心維護地方社會秩序的建制，在18世紀，這些建制包括某些治水工程、學校、以及糧倉。官員們在家鄉本身就是地方士紳的一員，同時也身處一個影響範圍更大的網絡中。在主要為農村的社會裡，官僚體系最底層的縣官一人通常必須負責數十萬名百姓，若沒有菁英的合作，監督——遑論控制——社會秩序的公權力，將鞭長莫及；而社會菁英們，或平民也是，在從事眾多日常活動時，是可以不受到官員協助或壓榨的太大影響的。我們可以從這套關係中，獲得一個觀察晚清工業化之社會、政治基礎的有用觀點。

募集資金、組織新產業的投資事業，這些挑戰皆具體地顯示了，要繼續維持社會安穩，再也不能單靠成功地落實一套國內統治方案了。對外來威脅的留意產生了一套特別的回應方式，而這套回應方式，至少在一開始是可以經由官員與士大夫的齊心協力獲得開展的。富有的商人菁英兼具資金以及管理才幹，理所當然地是官員開創事業時的合作夥伴。起先籌募資金的方式包括給予捐輸者榮譽性的獎勵，（王奎 2008：163-170）政府債券內需在後來的成長，靠的即是這種讓商人菁英們承當某事物的社會責任感，這事物既被視為是捐輸或放貸，本身也同樣是有利可圖的金融商品。官員們則轉而向國內外貿易徵稅，以帶動財源開啓新的投資事業。（周志初 2002：208）商人與官員攜手，為創設近現代工業籌措資金。但是，在清朝最後十年之間，商人與官員之間的差異卻變得越來越明顯——雙方都繼續追求財富與權力，但雙方不同考量之間的衝突較勁，卻益發地要比他們仍繼

續相輔相成的努力基石還來得醒目。

在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晚清政府開始讓菁英能更直接地參與政府運作，如在某些地區，以菁英為首的單位著手進行徵稅工作。雖然說在此之前菁英們已經較不正式地參與收稅工作，但現在，官僚體制策辦了一些機關單位，讓菁英能更公然地參與。1904年商會開辦，即是這個趨勢的重要例子，它清楚界定了菁英參與政府各項活動的、更正式的機構性基礎。對官員來說，他們期望中的商會將協助他們辦理各種商業事務，一如過去數十年、數世紀中商人較不正式地為他們所做的事情一樣，但是，隨著政府對商人的需索——特別是稅額——增加，商會遂也成了商人的媒介工具，商人透過它來跟官員周旋，以確保、抬高自身利益。這像是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的「利益團體代表」，也比較接近我們心目中商人團體會做的事。（馬敏、朱英 1993）相形之下對我們來說較隱晦不明的是，在經濟相關事務上，商會與官員的互補角色中那個持續存在的、舊有的邏輯。有關這個持續主導的舊邏輯，一個基本的例子，就是商業糾紛的化解。以往，解決商業糾紛的程序多半倚仗商人自己化解齟齬，只有當他們無法在信用、貨物移轉(disposition of goods)與類似問題上達成共識時，才會轉而尋求官員協助。³經濟史家喜歡將法庭與契約的正式發展當作歐洲專屬的現象，和伊斯蘭世界依賴非正式制度作對照，然而，中國的證據卻顯示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制度機構是如何可能在化解商業糾紛中一起發揮作用；(Greif 2006) 即使歐洲與伊斯蘭兩方制度的強烈反差並未言過其實，中國的作法也肯認了，在單一系統內，確實有可能混合正式跟非正式兩種元素。晚清時期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關係演變是一扇窗，供我們憑眺在官員及經濟菁英(economic elites)之間浮現的種種政治與經濟關係。

19世紀晚期官員、菁英之間應對彼此的不同方法，靠的是一套在

3 這個主題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博士生戴史翠(Maura Dykstra)博士論文研究的一部份，她仔細地重建了晚清時期四川重慶市的商人團體成為解決商業糾紛位址的方式，這些商業糾紛的解決，被期待可以嵌合進一套有官員涉及的、更長的可能步驟中以解決不完備或是有爭議的交易。

數百年間發展成熟的作法技藝，這些方法同時也提供我們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視角，去衡量企業管理中的官—商關係。雖然官員經常因為他們對公司的經濟管理進行政治干預而遭受批評，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見到，政府嘗試著要整合運用官員和商人兩邊的心血成果，比方說，他們企圖把不管是來自官方稅收或商賈捐獻的資金都放在同一個原則底下運用。在這樣的嘗試底下所隱含的假設是，官員與商人在打造新式產業時，遵循著同一個方案。這一方案從屬於一套更為深廣的政治經濟原則，若要更妥切地理解這個恢弘的原則框架，我們應進一步理解晚清的農業政策——幾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繁榮之基石。

（二）晚期清朝的農業政策方案

對中國史學者而言，國家對農業的關切，一向是政治哲學和官方政策中眾所周知的基本特徵。政治存續力，以及社會安穩，皆有賴於繁盛的農戶社會自給自足並供給統治者；國家財政生命力與百姓福祉休戚與共，因為在兩千多年來中國王朝史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憑藉的是農業，而非商業貿易或手工業。於是，如何促進生產、解決糧食供給不穩、確保資源貨物在帝國市場內暢通無阻，便成了官員的關懷重心。從兩千年歷史的角度看來，18世紀是政府種種努力的高峰：將人民安置到未開發土地上，處理各式各樣的治水計畫，蒐集散布新品種作物與栽培技術的資訊，維護社會以服務那些遭遇歉收的城鄉人口，以及監督市場制度以調解那些會拖慢交易流程的衝突摩擦。中國政府，或較精確地說來，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在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之間預設一層緊密連結，並且認為，如果將來發生對皇權構成威脅、甚或推翻皇權的社會騷動，鄉村就是這些騷動的腹地。

有著這樣的一段歷史，19世紀晚期知識份子與官員會繼續將農業視為是國家根本重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晚清的農業政策受到學界較低關注的箇中原因，只有研究者總是將注意力偏重在工業化的經濟政策指標才能解釋；而一旦這些農業政策對晚清政治經濟的重要性受到某些作者認可、被納入考量，它們方被當作是近現代的、因而有別於之前的傳統政策。例如，魏文享對1924至1949年農會進行的研究，

就是從傳統鄉村機構和近現代組織形式之間的對比入手，這些組織原來是在清朝的最後十年隨著商會一同設立的。他主張，鄉村機構的傳統形式，由於奠基在親屬關係或地緣關係上、其組織者是當地人民而不是國家，因而缺乏更宏大的結構；此外，它們也缺乏任何法律基礎能把官員給拉進來談判交涉，反而必須仰仗官方認可它們的活動；最後，它們且缺乏「權益訴求的意願及目標」。（魏文享 2009：28-29）這個詮釋，隱約地在傳統／近現代、國內／國外這兩組二分法中間劃上等號，從而模糊了一個事實：所謂的傳統元素，其實存在於被標識為「近現代」的諸多形式中，就像農會那樣。毫無疑問，商人與工業企業主(industrial entrepreneurs)的組織模式影響了農會的組成設立，（王奎 2008：289）但當中更根本的一點是，不管工商協會與農會，都援用了將官員與菁英團結在一起的、社會組織之政策原則與政治邏輯，這些原則與邏輯，在前幾百年的時間裡頭已經出現，而後並傳神地表現在晚清「官民一心」的說法當中。（朱英 1996：52）

王奎的研究觀察到了，特別就農會而言，政府期待人民能以推廣農業教育、農學新方法、與農戶間的互助合作為目的，自發地組成這些團體；更具體來說，他們實驗種子品種、從事治水計畫、組織開墾、監督收成情況與糧價、應對物資短缺危機，（王奎 2008：285、299）而所有這些事務，早在前幾世紀中就有機構在努力推展了，只是當時它們並不叫作農會罷了。因此，不僅農會的許多活動對好幾代的官員與百姓來說並不陌生，當中不少組織形制，乃至其組成邏輯，都跟先前的慣例作法相去不遠。

除了自發創建農會的政府呼籲以外，王奎主張，推動農會遍布帝國各縣的積極作用力(active force)，是仕紳菁英(gentry elites)與官員的結合。農會與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的省級總會，被一起編進了一個垂直整合系統中，（王奎 2008：287-288）而這個有官僚監督的垂直整合系統，與18世紀義倉及社倉所採用的形制之間，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相似處：原來在社倉與義倉成立的背後，有一套強調當地人民自願行動的修辭（這個想法可以追溯到宋代，包括朱熹在內都曾呼籲百姓成立這類倉儲），但是，這些糧倉的實際擴展，仍得靠官員與當地菁英共同

努力，二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依不同地區情況而變化。(Wong 1997b) 除此之外，18世紀絕大多數監控食糧儲備的情況，都是先由縣級、府級政府向省級官員報告儲藏情形，再由省級官員將這些資訊彙整成月報上呈，最後在中央層級完成監控。(Will and Wong 1991: 63 -72)

明清時代，中國官員以及鄉村地方菁英都盼望能齊力推動一個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的儒家式方案，雖然當中確實也有發生摩擦與糾紛的可能，但這個治理方案，仍兼具了能夠穩定社會秩序的地方機構，以及指導這些機構成立維護的意識形態。(Wong 1997a: 105-126) 如同較激烈醒目的、種種遏止鴉片的努力一般，晚清農會至少有部分情況符合這個齊心協力的邏輯，(Wong 2000) 這個政治運動將菁英動員起來，當作官僚體制的延伸。當然，在其它時空之下的政府，同樣也依賴平民扛起原屬政府當局的職責，例如19世紀美國的德州遊騎兵(Texas Rangers)，便屬於在缺乏大量政府基礎建設的西部邊域，指定地方正派人士協助維護社會秩序的這個慣例。菁英與官員談判交涉的傳統，對歐洲的國家建構來說不可或缺，然而中國卻是在缺乏這個傳統的情況底下發展出這種關係；(Wong 1997a: 93-101) 訴願權(right of petition)的原則，以及法律辯護的實踐，形構自歐洲建構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制度與意識形態，而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並未在中國發展。

一如商會，中國農會致力要完成那些幾百年前官員與菁英已經推動的優先事務與目標；不管商會或農會，它們都將過去較不正式地進行的事物給更加正式化了，並且吸收新技術、新方法來處理那些源遠流長的關懷考量。諸如作物的科技資訊以及新技術的提倡，都能被看作是以往農業推廣教育方案的一部份而受到農會接納。這樣的嘗試，甚至能進一步擴及至世界博覽會的參與上——中國政府精心挑選了特別的農產品到會場上展示。(王奎 2008: 302) 舊有的作法雖構成了更廣大的模式，但由於它同時對改變抱持開放態度、保持靈活彈性，新的作法便能夠成為它的擴充或補充。農業創新發展與散播宣傳，和推廣工業的努力並肩同行。在這兩者間的關鍵連結，便是向來遍布鄉村、成了小鎮特色的手工業：它們的產品加入了新式工業商品的行列，在那些運用大型昂貴技術的都市工廠中生產。

（三）中國的工業：從手工到工廠，從鄉間到城市

我們能指出清朝末年的產業推廣當中有一些不可能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存在的元素，但於此同時，在這些推廣的努力當中，還有一些跟昔日作法強烈呼應的特色，如果我們一心只找尋新作法，就會把這些特色給忽略掉，然它們並不會因為以前曾出現過，便必然較不重要。晚期的大清國嘗試在帝國內各個角落蒐集有關產業生產的資訊，這個努力所仰賴的一個關鍵，就是工藝局的建立。如同明清中國官員所建立的其它垂直整合系統，工藝局計畫致力在帝國內超過一千三百個縣中分別設局，並要省級的局收集轄區內的資訊、上呈到中央政府去；而也如同晚清政府所做的其它嘗試，成立工藝局，須借助官員與仕紳們共同努力。（王奎 2008：217）這些局的負責範圍——涵蓋了紡織、染衣、木工製品、皮革貨物、漆器、刊物生產以及彩色印刷——包含海外引進的技術，但又不侷限於此。（王奎 2008：221）並沒有什麼是近現代、什麼是傳統的清晰關鍵分別，傳統事物正被以近現代元素加以改變，而不是一竿子地給汰換掉。

1904年，由工藝總局集結在北方直隸省設局的相關記述而成的《直隸工藝志初編》（周爾潤編 1904），清楚說明了工業與鄉村生產的整合情況。這份報告的第一章描述了有關產業生產資訊的彙整原則，聲稱：「工產無論貴賤粗細大小多寡」皆須包含在內。中國北方到1920、30年代，仍繼續以同樣的認識方式來描述當時諸多情況。如定縣這個地方——不只因為在此地進行的農村生活研究，也因為那些受美國慈善家資助到西方求學的中國人在此地鼓吹各式改良改造而知名——有一份鄉村產業調查，重申了手工生產的重要性：根據這份調查估計，在共四十萬名工作人口中，有約一萬五千名男性以及超過六萬五千名的女性在家庭裡參與產業生產工作。（張世文 1936：1）就整個中國大北方來說，鄉村的手工產業看似是整合進季節性的農業勞力需求中，然而，這種連結並不必然代表手工業就會在家裡面進行，因為英、法兩國製造業的早期階段，也都有和農業勞力需求的規律一致的季節性生產模式。（Sokoloff and Dollar 1997; Postel-Vinay 1994）就中國的某些案例來說，鄉間農戶的紡織產業，可以透過採納海外技術

而蓬勃發展，比方說高陽縣這個地方，它不只是中國共產黨1932年首次嘗試成立的北方根據地，同時也是一個棉紡織業繁盛的縣份，其繁盛發展的要素之一，就是鐵輪機(iron gear loom)的採用，這個技術係自日本引進、在中國複製以供鄉村紡織戶使用。這些紡織戶的貨物透過中國北方商業網絡銷售，這個網絡將他們與變動的市場供需牽連起來，而他們則用生產各式各樣的棉製商品的方式來回應調適。(Grove 1975, 2006)

江南地區的手工業演變，則相異於上述中國北部的案例，原因在於主要位在上海的都市型工業創造了一個大不相同的經濟脈絡。歐美的工業化經驗以及二戰後形成的經濟發展理論，都使我們充滿自信地把鄉村等同農業、都市等同工業，從這個觀點看來，上海以輕工業（諸如織品、麵粉、火柴、食用油等等）為基礎而發展的都市工業，很可能會讓我們預期鄉村手工產業的消逝，如果再加上那些批評帝國主義強權以進口商品取代在地貨物的聲音，那麼，很難有理由期待江南手工業能夠在近現代都市生產以及外來競爭的雙重夾攻下存活。儘管如此，根據江蘇工資的數據資料，可以合理地論證，經濟成長不只發生在上海都市中心而已，它更遍及了地方鄉鎮，這些鄉鎮數百年來都生產著手工業產品、透過密集的市場網絡出售。(Rawski 1989: 299-307)

江南地區的江蘇省，其紡織業之生意盎然可見於《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中。這份報告書是1919年春天省政府調查縣級經濟活動的成果，在本書的「工業」一節裡，可以看到各個縣份呈現各種不同的情況（江蘇省長公署第四科編：267-301）：有的縣在小鎮裡設有幾座工廠，當中有些是官辦，有些則否；而在其它沒有工廠的縣裡頭，有的，則另外有一些被稱為「民間工業」的非工廠產業。這裡的「民間」一詞，在其它脈絡裡代表著政府活動以外的非官方活動，又或者，在另外一些脈絡中，意味著諸如民俗藝術、文學、舞蹈等通俗流行活動。江蘇省政府的調查辨識出了一種非奠基於工廠的「工業」類別，它指的是那些民衆視為是物質生產、以經常被稱為「民間」的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方式所從事的手工業。於是，這個調查記錄了那些在上海都市工廠製造業的成長中倖存下來的民俗工業(folk

industries)，也就是說，當其它鄉村產業已經被它們與都市產品的連結給改變了的時候（如鄉村棉紡織業因為與機製棉紗的連結而產生轉變），有一些像是製扇與縫製米袋的手工業繼續堅持了下來。

費孝通(Hsiao-tung, Fei)，倫敦求學、中國最知名的人類學家，在其1939年出版的知名英文研究《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39)一書中，強調鄉村產業對江南農村與小鎮的重要性。費孝通隨後在1957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1950年代鄉村產業滅絕，該文章所陳述的觀點，必須要等到二十五年後、他再次提筆書寫這個主題時，才被接受而廣為流布。於是，在1989年，當中國國內外已經有可能體認到，鄉村工業對於改革開放中的工業擴張來說逐漸成為一關鍵要素的時候，費孝通的這些文章，連同其它稿子，乃英譯而集結成冊，以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spect and Retrospect*(1989) 題名出版。20世紀晚期的鄉鎮企業爆炸般地成長，在通常採用新技術的小工廠環境背景底下，製造了一系列各色各樣的輕工業消費性商品；這些公司雇用了大量過去未充分就業的勞工、透過各種管道募集資金，它們並且在1980年代替這個國家貢獻了半數以上的產業成長值，直到1990年代，仍持續發揮重要性。不像費孝通，許多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在考察中國近期經濟轉變時都沒有察覺到，中國過往的鄉村產業模式，以及直到20世紀末期的鄉鎮企業增長，兩者之間有一個清楚的連結。新自由主義市場觀點，簡單地將這個變遷視為是從專制壓迫的政府手中解放後、市場成長的自然結果；鑲嵌於對那些推廣鄉鎮企業的政治情勢更密切評估的詮釋，則往往著重地方黨員幹部的關鍵行動者角色。以上這兩種觀點，都不太能夠解釋如何、為何會出現這個更恢弘的產業變遷模式。

當然，鄉村產業增長之所以有可能發生，我們不可能不考慮進黨國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好比當我們考慮直到20世紀中期潰滅為止曾一度欣欣向榮的手工業時，不可能忽略國家政策在其瓦解中所扮演的根本角色。1978年秋天中央批准了農業政策變更，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然而，Lynn White針對上海地區的研究，記錄了早在這個序幕被正式拉開以前，城市外小型產業企業的成長。White解釋，1970

年代早期，上海地區的官員們，爲了取得他們在當地企業投資人心中的公信力、進而恢復政治正當性，決定允許企業向鄰近縣份中能生產原料的工廠求援，好讓它們可以在國家計畫的限制之外，追求一些額外產量。(White 1998) 倘若沒有20世紀頭幾十年中都市和鄉村產業之間持久而多元的連結存在的話，這事發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而這些連結又是隨著晚清的政策締造而成的，這些政策將鄉村工業視作一種工業活動的形式，認爲它不但可以直接提升農業人口的物質福祉，也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

(四) 晚清中國的財富與權力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諸多經濟發展模式之間存在著至關重要的連結，但這些連結卻因爲我們一心專注在某些特徵上而每每被忽略掉。箇中原因，很大一部份是因爲那些特徵較接近我們心目中認爲是重要變遷的表層，它們與其它我們更不陌生的歷史中的特徵相似，而這些歷史又主宰著我們對其他社會——如中國——的觀感；因而，假使我們能穿越表層，向當今的既成地貌之下挖掘，便能夠揭露經濟變革何以在中國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幅度發生的部分原因。但，另一方面，整體上的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並且更精確點說，特別是它在晚清的形構，和其它更不陌生的若干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諸多相似之處，也並未總是被充分理解。在近代早期歐洲許多地區風行的重商主義，其中一個基本理念是，財富與權力爲國家建構者追求的雙重目標。政治領導人皆致力以生產更多、外銷更多、以便積聚更多金錢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家更富有、更強盛，這些對金錢與資源的渴望與追求，便同時透過經濟與政治兩個途徑表現。國家和各國商人，皆致力於壟斷殖民地貿易以及如香料、糖、茶葉等近代早期新商品的來源，近代早期的歐洲國家建構者，連同商人階級，在各國間進行了一場政治與經濟競賽，爲歷史轉變動態(historical dynamics)的關鍵元素提供了動力。這個歷史轉變動態，現在我們已經將它一般性的視爲近現代國家的形成，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

晚清追求財富權力的目的，確實是要讓中國這個國家以及中國經濟更能夠和西方國家經濟並駕齊驅、然後讓中國能更加強盛繁榮。但

基於兩個基本的理由，我們卻誤解了他們的努力：首先，我們用來衡量晚清政治經濟體制的標準，適用的是在19世紀歐洲誕生的國家與經濟體制，通常和重商主義的邏輯無關；其次，我們尚未用明清時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之政策、政治優先性的立場為考察角度，來充分解釋晚清政治經濟和19世紀資本主義式、抑或近代早期重商主義式的政治經濟體制之間有何不同。

以工廠為基礎的產業，在實現財富與權力的雙重目的中同時發揮作用：重工業讓國家更強盛，輕工業則為消費市場製造商品。因此，晚清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成分中，便有一部份既包含對帝國主義的明確回應，同時也確認、擴展了先前對新式經濟活動嘗試接納的領域範圍。為了回應外來挑戰而誕生的、成立新工廠及官僚職缺的渴望，加重了需求開銷，這意味著近代早期「量入為出」的經濟準則將轉變成為「量出為入」；換句話說，國家的支出需要，驅使官員創造一些新的開源機制聚積資源，而非以撙節開支的方式來適應可用的稅收收入。中國在19世紀晚期面對的這個難題，事實上，和那些近代早期歐洲國家建構者所面對的很相似。一如那些國家建構者（確實也如同早先的漢代與南宋官員），晚清官員倚賴商業稅收收入；他們還學會了利用貸款、發行債券來籌錢，而這些籌錢的機制，最初是由歐洲人策畫、以便汲取國內財富資源並開發國外金融市場的。在中外政治經濟交涉之下，產生了諸多前所未有的難題以及種種制度選擇機會，使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在許多地方發生了改變，而這些新出現的特徵，卻主導了我們看待晚清情勢的觀點，以至於我們幾乎未曾想過，這些努力與嘗試，實際上屬於一個更長遠的規畫，在這個規畫裡，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始終都還是過去那些國內關懷議題。

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對比——世紀頭十年中的中國人，要不鼓吹改革，要不鼓吹革命，還有少數人仍觀念保守地堅持從固有社會文化當中回溯——帶來一套過於簡便潦草的選項，它忽視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當中的基本開放性，能夠容納、調適像是工業化的種種新作法，以達成政治領導人再熟悉不過的那些目標。除此之外，為了定位晚清政治經濟行動者的觀點，歷史學家供應了一份選項菜單，這份菜單卻未能

將官員與菁英之間流動不居的關係，放在中國歷史與社會的理解中充分脈絡化；相反地，它在其上強加了歐洲歷史經驗鍛鍊而成的典範，在這個歐洲經驗裡，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當然，實現方法因地而異——是近代早期以及特別是近現代國家建構的重要特徵。

中國治理的方式，是期望能夠對一些社會組織與活動發揮影響力，甚或獎掖提攜它們，使它們能在某時某地相當獨立自主，但同時又能隱約維持著被利用來實現官方制定目標的潛力。不管我們觀察的是商會還是農會的角色，晚清官員都假定，這些機構和國家擁有同一套優先事務的工作方案。雖然官員們確實疏忽了都市和鄉村機構之間迥然有別的經濟利益，但學界一心搜尋競爭與衝突的例子，以致於未曾考慮官員與菁英經常扮演互補角色的情況，也同樣是誤入歧途、甚至更不可原諒的，因為，選擇一副聚焦在歐洲現象上的透鏡當作分析中國作法的基礎，根本不能期待可以看見一幅鮮明清晰的景象。我們已蒙蔽了自己，無法理解晚清政治經濟體制是如何在一邊回應帝國主義的同時，一邊確認那些長久以來政治優先事務中的基本信念。那些在提升平民物質福祉這個邏輯當中致力最深者，並未讓自己陷入任何國家衰頹的糾結修辭中。相反地，他們清楚地知道——甚至比大多數後來評論他們回應帝國主義之努力的人都要來得清楚——這種種的嘗試努力，只是一套更恢弘方案的局部內容，這套方案在昔日為帝國服務，而在將來當帝國不復存在時，它仍然會繼續對政治思考發揮影響。

中國官員、知識份子與經濟菁英如何理解他們所身處的情勢以及面對挑戰時所付出的努力，釐清這點，不只對歷史學者理解這個個案來說相當重要，它同時也是一種方法的範例，這個方法要重新形構一些途徑方法，讓社會理論能超越巨型結構分析（其缺陷已在二十年來的批評中被承認），以致能夠了解歐亞各帝國之政治命運、它們的轉型對其治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在個別帝國境內發生或遍及歐亞大陸之經濟變革的邏輯。

四、結論

國家與宗教、財政作法和工業化這三方面關係各自揭示了獨特的一套中國與歐洲作法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致力於同時評估相似性與差異性，則鼓勵我們避免有簡化的期待，以為世界各地與日俱增的連結將孕育出更加齊一均質的世界。聚焦於比較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作為，將銳化我們對多元分殊的理解：人們過往已能組織他們的政體、經濟活動和宗教表現，以及這些鮮明對比的歷史特點如何有助於我們了解後繼的模式並非單一歷史可能性樣板的各種例證。正當世界各地之連結自近代早期至現代時期日益密集，我們的當代世界仍是由這些地區所組成，而各地近代早期之多樣歷史將影響著我們全球的未來。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王奎。2008。《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英。1996。《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江蘇省長公署第四科編。1919。《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周志初。2002。《晚清財政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周爾潤編。1904。《直隸工藝志初編》。天津：工藝總局。

馬敏、朱英。1993。《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張世文。1936。《定縣農村工業調查》。北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魏文享。2009。《國民黨、農民與農會：近代中國農會組織研究（1924-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外文書目

- Bendix, Reinhard.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man, Harold.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I: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John. 1990.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Wellington. 1980. "Government, merchants, and industry, 1870-1911,"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The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K.C. Liu, pp. 416-4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ao-tung, Fei.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G. Routledge.
- . 1989.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uerwerker, Albert. 1958.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ove, Linda. 1975. "Creating a Northern Soviet," in *Modern China* 1(3): 243-270.
- . 2006. *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Hoffman, Philip and Rosenthal, Jean-Laurent.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fare and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cal Less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N. Drobak and John V.C. Nye, pp. 31-55.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gerwey, John. 2010. *China: A Religious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97.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edited by Tracy, James D., pp. 22-

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Patrick. 2012. "Afterword: Reflections on fiscal foundations and contexts for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ally effective Eurasian states from the rise of Venice to the Opium War," in *The Rise of Fiscal States: A Global History 1500-1914*, edited by Bartolomé Yun-Casalilla and Patrick K. O'Brien with Francisco Comín Comín, pp. 442-45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stel-Vinay, Gilles. 1994. "The Disintegration of Labour Market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n *Labour Market Evolution*, edited by Grantham, George and Mackinnon, Mary, pp. 64-83. New York: Routledge.

Rawski, Thomas.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koloff, Kenneth and Dollar, David. 1997. "Agricultural Season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Early 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2): 288-321.

Sutton, Donald et. al. 2007. *Modern China* 33(1): 3-158.

Tilly, Charles.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92. Rev. ed.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Watson, James L.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an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9,"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hnson, David et al., pp. 292-324. ..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ite, Lynn III. 1998. *Unstately Power vol. 1: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rmonk: M.E. Sharpe.

Will, Pierre-Etienne and R. Bin Wong, with James Lee. 1991. *Nourish the People: State Civilian Granaries in China, 1650 18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Studies.

Wong, R. Bin (王國斌) . 1997a.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7b. “Confucian Agendas for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in Modern China,” in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edited by Hutters, Theodore et al., pp. 303-32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Legacy” in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edited by Brook, Timothy and Blue, Gregory, pp. 210-2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Opium and Modern Chinese State Making,” in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edited by Brook, Timothy and Wakabayashi, Bob, pp. 189-2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13. “Regions and global history,”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Berg, Max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side, Alexander. 2006. *Lost Modernities: China, Vietnam, 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un-Casalilla, Bartolomé. 2012. “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asia from a global,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Rise of Fiscal States: A Global History 1500-1914*, edited by Yun-Casalilla, Bartolomé et al., pp. 1-3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n-Casalilla, Bartolomé and O’Brien, Patrick K. with Franciso Comín Comín. eds. 2012. *The Rise of Fiscal States: A Global History 15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資料

- Habermas, Jürgen. 2008. “Notes on a Post-Secular Society.”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14.html>。 (2014/07/30瀏覽)